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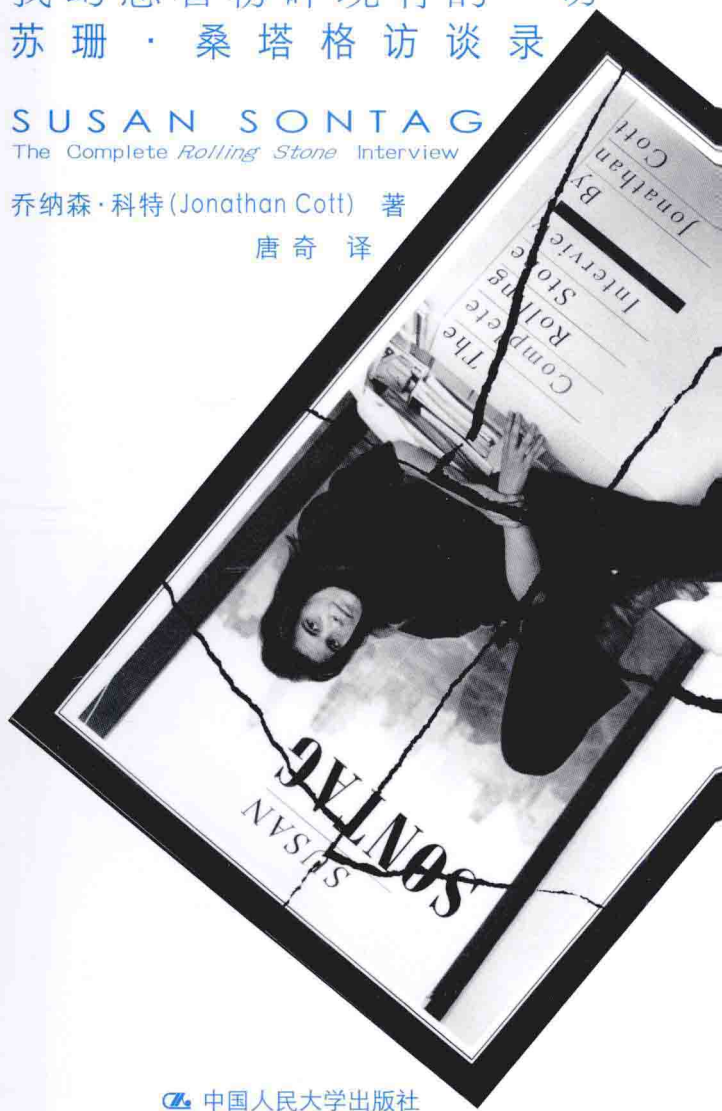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SUSAN SONTAG

The Complet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

乔纳森·科特 (Jonathan Cott) 著

唐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usan Sontag

The Complete *Rolling Stone* Interview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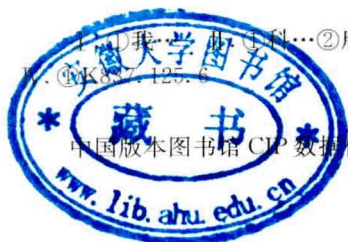
乔纳森·科特 (Jonathan Cott) 著 唐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美）科特（Cott, J.）著；唐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6
ISBN 978-7-300-194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3569 号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乔纳森·科特 著

唐奇 译

Wo Huanxiang zhe Fensui Xianyou de Yiq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35 mm×19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7.3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05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他搅动了思想上的一潭死水，但代价使他成了思想上的探索者，徘徊在无人涉足的思想上的空白地带，沿着这条路步步前行，寻求在所看到的地平线上某处的另一个栖息地。这样的犹太人既不是勤恳工作的人，也不是知足的人。只能说他们是不安分的外国人。

——索尔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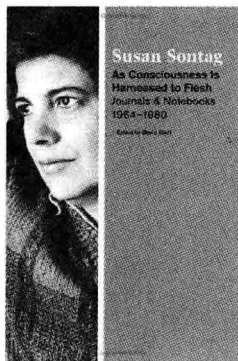
当一个人死去，我们就失去了一座图书馆。

——古代基库尤^① (Kikuyu) 谚语

^① 基库尤族是肯尼亚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个民族。——译者注

序

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写道：“唯一适应精神生活的隐喻，就是感受到在生活。没有呼吸，人类的身体就死亡了；没有思考，人类的心灵就死亡了。”苏珊·桑塔格同意这种观点。在她的日记和随笔第二卷（《意识听命于肉体》）中，她说：“做一个睿智的人，对我而言，并不是将事情做得‘更好’的问题，那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我知道自己害怕被动（和





苏珊·桑塔格（青年）

依赖)。运用我的心灵，令我感觉积极（和自主）。这样很好。”

桑塔格出生于1933年，2004年逝世，作为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政治活动家，她的一生见证了思考人生如何成为一种令生命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活动。自从1966年出版第一本随笔集《反对阐释》开始，桑塔格对“流行”和“高雅”文化的忠实就从未动摇，这本笔调轻快、平易近人的文集涵盖了从至上女声三重唱^①到西蒙娜·韦伊^②（Simone Weil）、从电影《不可思议的收缩人》^③到《穆里耶》^④的广泛内容。正如她在该书30周年纪念版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⑤（Dostoyevsky）和大门乐队^⑥之间，我当然会选择陀思妥

① 20世纪60年代美国流行乐坛盛极一时的女子三重唱组合。——译者注

② 西蒙娜·韦伊（1909—1943），犹太人，神秘主义者、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译者注

③ 1957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电影。——译者注

④ 阿伦·雷乃1963年执导的法国电影。——译者注

⑤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译者注

⑥ 1965年成立于洛杉矶的美国摇滚乐队。——译者注

耶夫斯基，但问题是我干吗非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作为“艺术色情学”的支持者，她赞同法国作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所谓的“文本的快乐”，还有他把“心灵的生命称作欲望、完全的智慧和快乐”的观点。在这方面，她追随威廉·华兹华斯^①（William Wordsworth）的脚步，在他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将诗人的任务定义为“直接给一个人以愉快”，这一任务对他的要求便是“对于宇宙间美的一种承认”、“对于人的本有的庄严性的一种顶礼”，并且坚持“对于以爱来观看世界的人”，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是一种轻而易举的工作”。

“是什么让我感觉强大？”桑塔格在一篇日记中自问，她给出的答案是“爱和工作”，以及她对“心灵的狂喜”的肯定。显然，在桑塔格看来，爱、欲望和思考从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活动。桑塔格非常欣赏的作家、诗人和古典主义者安妮·卡尔森（Anne Carson）在她迷人的作品《爱

^①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注



安妮·卡尔森

欲之苦乐》中提出：“认知在思想者心中起作用的方式，与爱神在恋人心中起作用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卡尔森还说：“当心灵开始寻求认知，欲望的空间就敞开了。”桑塔格在她关于罗兰·巴尔特的随笔中附和了这一观点，她写道：“写作是拥抱，又是被拥抱；每一种观念都是向外延伸的观念。”

1987年，在由美国笔会发起的一次关于亨利·詹姆斯^①（Henry James）的研讨会上，桑塔格将安妮·卡尔森关于欲望与认知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观点进一步延伸。桑塔格拒绝通常对詹姆斯词汇贫乏、用语抽象的批评，她反驳说：“事实上他的语言是一种慷慨、一种充实、一种欲望、一种欢呼、一种狂喜。在詹姆斯的世界里，总是有更多——更多的文本、更多的意识、更多的空间、空间中更多的复杂性、可供意识咀嚼的更多的食粮。他在小说中植入了一种欲望的法则，在我看来是全新的。这便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欲望——认知的欲望——就像肉体欲望一样，并且经常成为肉体欲望的模仿品或复制品。”在她的

^①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作家。——译者注

日记中，桑塔格用这样一连串词汇来描述“心灵的生命”：“贪婪、欲望、渴望、热切、向往、意愿、不知餍足、兴高采烈”；不难想象，在桑塔格看来，当安妮·卡尔森坦承“恋爱和认知这两件事让我真正感觉到活着”时，这也说出了她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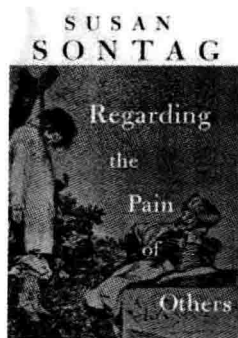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桑塔格都试图挑战和颠覆传统，冲破性别、年龄等等诱导人们循规蹈矩去生活的分门别类的限制；她相信彼此对立的事物，比如思考和感觉、形式和内容、伦理和美学、意识和感官，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体两面——就像天鹅绒的绒毛，正着摸和反着摸是两种纹理和两种感觉、两种明暗和两种理解。

例如，在1965年的随笔《论风格》中，桑塔格写道：“把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称为杰作，并不是在以美学的宽容来掩盖纳粹的宣传。其中存在着纳粹宣传，但也存在着我们难以割舍的别的东西……灵气、优美和感性的复杂动态。”十年后，她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中又反其道而行，评价《意志的胜利》是“有史以来最纯粹的宣传影片，其构思本身就排除了该电影制作人能够拥有一种独立

于宣传的美学构思的可能性”。桑塔格的解释是，她起先关注的是“内容的形式含义”，后来则希望探索“形式这个概念本身的内容含义”。

桑塔格自称是“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这与华兹华斯不谋而合，华兹华斯说“只有愉快所激发的东西，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对苦痛表示同情，我们就会发现同情是和快感微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毫不奇怪，桑塔格在拥抱她所谓的“多元性、多样性文化”的快乐的时，从未停止“旁观他人的痛苦”——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就以此为主题命名——以及努力去减轻这种痛苦。

1968年，她应北越政府邀请，作为美国反战活动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河内，她在日记中说，这段经历“让我重新评价我的身份、我的



意识形态、我的文化心理、‘真诚’的含义、语言、道德决策、心理学表现”。20多年后，20世纪90年代初，她9次访问满目疮痍的萨拉热窝，见证了长期围困之下38万居民的苦难。1993年7月，她第二次访问期间，结识了一位萨拉热窝出生的戏剧制作人，他邀请她担任导演，与当地最出色的专业演员合作排演萨缪尔·贝克特^①（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狙击枪的枪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成了排练和演出的背景音乐，政府官员、医院的医生、前线下来的士兵，以及许许多多身心饱受摧残的萨拉热窝人观看了这出戏剧。“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她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写道，“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惊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正如她曾经宣称的：“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

我第一次遇见苏珊·桑塔格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而我是那里的学生。在三年

^① 萨缪尔·贝克特（1906—1989），爱尔兰作家。——译者注

时间里，我既是哥大校报《哥伦比亚观察者》的撰稿人，也是编辑之一。1961年，她为这份报纸写了一篇关于诺尔曼·O·布朗^①（Norman O. Brown）的《生与死的对抗》的评论文章，后来收录在《反对阐释》中。读完这篇文章，一天下午我厚着脸皮走进她的办公室，告诉她我有多喜欢它；第一次会面之后，我们又一起喝过几次咖啡。

1964年从哥大毕业后，我前往伯克利，在加州大学学习英国语言文学。我立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波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觉醒的中心。“幸福呵，活在那个黎明之中。”两个世纪前威廉·华兹华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写道。现在，人们正再一次经历着真正戏剧化的变革，无论你走到哪里，就像鲍勃·迪伦^②（Bob Dylan）在《郁结如麻》中唱的那样：“夜晚的咖啡馆传来音乐声，空气里弥漫革命的气息。”关于那段日子，大约30年后，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切似乎不乏美妙之处。人们多希望它的胆量、乐观主义和对商业的鄙视态度能多少残留一点下来。具有鲜明现代

① 诺尔曼·O·布朗（1913—2002），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译者注

② 鲍勃·迪伦（1941— ），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译者注

特色的情感的两个极端，是怀旧和乌托邦。或许，如今被贴上‘60年代’这一标签的那个时代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是它根本没有怀旧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

1966年的一天下午，我在伯克利校园里跟苏珊不期而遇。她告诉我她应邀来学校做一个演讲，我告诉她我刚开始在 KPFA 电台制作和主持一档原创的午夜栏目。我还提到那天晚上我正准备跟好友汤姆·拉迪（Tom Luddy）一起去采访电影导演肯尼思·安格（Kenneth Anger），谈谈他的影片《天蝎星升起》——不久以后汤姆就成了太平洋电影资料馆的馆长。我问她是否有兴趣加入这次谈话，她答应了。^①

1967年，我搬到伦敦，成为《滚石》杂志的第一位驻欧洲编辑，1970年回到纽约后我还继续为这份杂志工作和写稿。苏珊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无论在纽约还是欧洲，我们总能时不时地在同样一些晚宴、电影放映会、音乐会（既有摇滚乐也有古典音乐）

^① 在日记中，苏珊将安格的《极乐大厦揭幕》列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影片”之一。

和人权活动中碰面。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为《滚石》杂志采访苏珊，但是一直没想好怎样开口。不过在1978年2月，我觉得时机到了。前一年她出版了赢得广泛赞誉的《论摄影》，另外两部作品也即将面世：《我，及其他》和《疾病的隐喻》。前者是她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八个短篇，被她自己称为“与第一人称展开的一系列冒险”。苏珊在1974年到1977年间进行了乳腺癌手术和治疗，作为癌症患者的经历是她写作后者的催化剂。所以当我最后决定问她是否愿意做一次访谈，并提议将这三本书作为谈话的切入点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有些作家认为，参与一次访谈就像诗人肯尼斯·雷克斯雷斯^①（Kenneth Rexroth）在一次特别糟糕的鸡尾酒会后说的那样，是“晚餐前把舌头泡在烈酒里”。伊塔洛·卡尔维诺^②（Italo Calvino）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短文《一次访谈之前的遐想》中抱怨道：“每天早晨我都告诉自己：今天必须过得卓有成效。然后总会有某些事情让我无法写

① 肯尼斯·雷克斯雷斯（1905—1982），美国诗人、翻译家与评论员。——译者注

②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意大利作家。——译者注

作。今天……我今天要干什么？哦，他们要来采访我……上帝救救我！”更加抗拒访谈的例子还有诺贝尔奖得主 J. M. 库切^① (J. M. Coetzee)，他在与戴维·阿特维尔 (David Attwell) 的一次访谈当中说：“如果我有哪怕一点点先见之明，从一开始就不会跟记者扯上关系。十次访谈里有九次是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而这种模式的惯例允许这个陌生人跨越两个陌生人交谈时应有的恰当界线……对于我来说刚好相反，真理是与沉默、内省和写作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演讲并不是真理的源泉，而是一种弱化了、临时性的写作。主持人或记者挥舞的惊喜之剑不是真理的传声筒，相反却是一种武器，是访谈这种事固有的对抗性本质的标志。”

苏珊·桑塔格不这么看。“我喜欢访谈的形式，”她曾经对我说，“因为我喜欢交谈，喜欢对话，而且我知道我的许多想法都是对话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中最困难的事就是你孤身一人，不得不假装自己跟自己对话，这从根本上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我喜欢跟人说话，对话让我

^① 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 (1940—)，南非作家，200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者注